

记忆

MEMORY



[英] 帕特里夏·法拉 卡拉琳·帕特森 编
户晓辉 译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横跨人文、科学、艺术的年度盛宴

全球8位最前沿专

理查德·森尼特 / 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教授

凯瑟琳·霍尔 /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A.S.拜厄特 / 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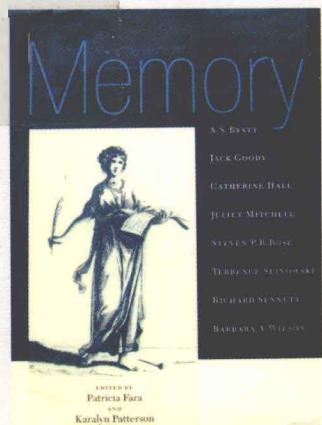
杰克·古迪 /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朱丽叶·米切尔 / 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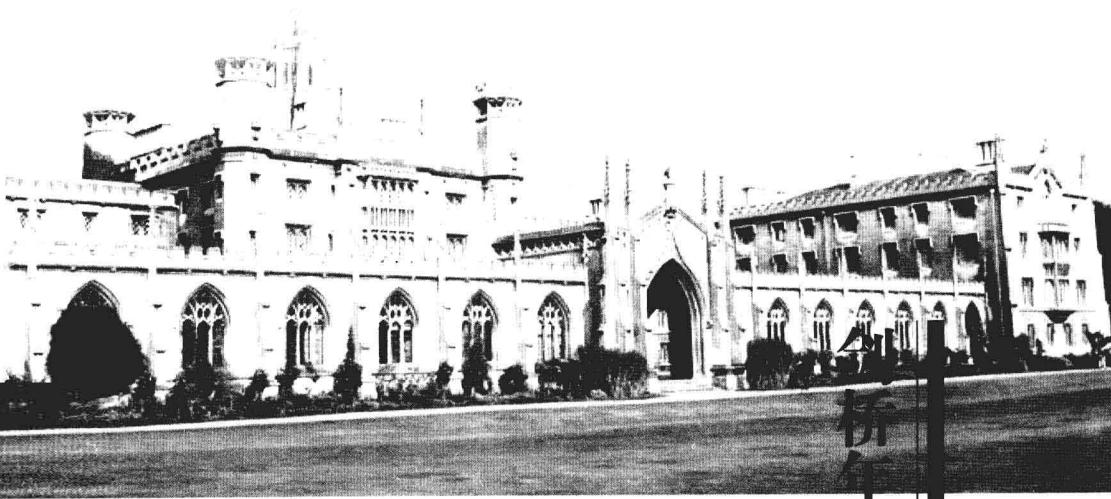
巴巴拉·A. 威尔逊 / 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

史蒂文·罗斯 / 德国开放大学生物系教授

泰伦斯·谢伊诺夫斯基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桥
度
主
题
讲
座

(Patricia Fara)法拉

(Karalyn Patterson)帕特森 编

户晓辉 译

记 忆
Memory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 / (英) 法拉, (英) 帕特森主编; 户晓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书名原文: Memory

ISBN 978 - 7 - 5080 - 6161 - 0

I. ①记… II. ①法… ②帕… ③户… III. ①记忆—普及读物 IV. ①B842. 3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578 号

Memory

Edited by Patricia Fara and Karalyn Patterson

© Darwin College, Cambridge 199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8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4 - 3914 号

记忆

[英] 帕特里夏·法拉 卡拉琳·帕特森 主编

户晓辉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1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70 × 970 1/16 开

印 张：11.75

字 数：171 千字

定 价：2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导言

Introduction

帕特里夏·法拉 (Patricia Fara) 在剑桥大学讲授科学史，曾经获得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奖。著有《电脑：它们如何工作以及它们做什么》(Computers, How they Work and What they Do, 1982) 和《变化中的世界》(The Changing World, 达尔文讲座系列, 1996) 等。

卡拉琳·帕特森 (Karalyn Patterson) 剑桥大学神经心理学家。1992—1994年任英国神经科学学会主席。



法国小说家昂利·司汤达 (Henri Stendhal) 在其《昂利·勃吕拉传》(Vie d'Henri Brulard) 中表述了试图重新体验自己前 30 年生活经历的一位自传作者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作出了许多发现……它们就像墙上壁画的一些巨大的碎片，早就被遗忘了，却突然又出现了，而且在保存完好的这些碎片的一侧有……很大的空隙，在此只能看见墙砖。原先画上壁画的石膏已经败落不堪，那个壁画也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但是——像司汤达一样——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和脆弱易变的。无论我们试图回忆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特殊的细节，还是要建构能够描述更大的文化变迁的历史叙事，我们都必须面对在重新经历过去时所固有的间隙和扭曲。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能力，对我们的存在来说是如此关键，并且引发了一种普遍的吸引力：作为个人，我们想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的记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作为社会成员，我们急于弄明白我们的历史被保存下来的种种方式。我们记忆的东西与我们如何记忆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已经想出了无数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这个复杂的联系网络。本书的八章，全部出自这些领域的一流专家，它们超越了这种变异而共同探讨了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记忆”(memory)这个词反映了多层含义的积淀，但这些含义可以分成两组意义。记忆可以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因而代表着一般被归属于大脑的一种功能。但是，它当然也意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一个人、一种情感、一段经历——的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记忆的这两方面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希望科学家参与研究记忆的过程，而人文科学的学者们则对记忆的结果感兴趣，本论文集则表明了这种二分法的谬误。

在其 1959 年的著名讲演中，斯诺 (C. P. Snow) 有力地描述了把现代社会分割成科学和艺术的那“两种文化”。这种基本的划分源于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的著作，在启蒙时期又得以强化，当时学者开始画出新的学科界限来描绘知识的蓝图。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们把人类的知性分割为三个主要的区域：记忆，包括对历史的研究；理性，多数由我们所说的科学构成；想像，宽泛地说，即诗歌和音乐之类的艺术领域。尽管这种知识的零散化在过去200年中持续存在着并且得到强化，但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科的挑战。本书的研究是有意在学科之间进行的，它们寻求研究记忆的洞见，而这些洞见能够通过把敢于越出正常学科界限的专家的互补视角并置在一起获得。作为编者，我们以一个连续的系列编排了这些论文，用习惯的说法，就是从记忆的历史研究向科学研究展开。但是，它们由反复出现的几个共同的主题连接了起来，这些主题包括记忆的物质载体，记忆的技术，集体记忆，对过去的再解释和记忆的失败。我们希望读者和我们的作者一样逐渐明白，先前的理解如何能够通过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考察某个话题而被丰富起来。

谟涅摩绪涅^①——希腊缪斯女神之母——在传统中被刻画为一个身披绿色常青柏的年轻女性，拿着她的记录工具，一本书和一只笔。本书护封显示出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理论家乔治·理查森（George Richardson）如何在视觉上诠释了这个象征，该象征在200年前已经被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颇有影响地经典化了。尽管这种隐喻的表现现在离我们的理解似乎已经比较遥远，但它们启发了试图用美学关系来界定道德问题的许多欧洲艺术家。

和里帕与理查森一样，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文本是我们最重要的记忆宝库：所罗门群岛的岛民贴切地生造了“属于记忆的房间”（House Belong Memory）这个混杂的表述形式来描述他们的民族档案馆。但正像本书的插图所演示的那样，记忆也以许多其他的方式得以珍藏。例如，澳大利亚在一个教堂似的记忆宫殿里纪念其阵亡的战士，在那里，悼念者都佩带迷迭香，自罗马时代以来，它就是回忆的一个植物象征。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都保存着前代文明的物质证据，而艺术画廊则展示着一些图片，其隐秘的象征回荡着文化的记忆。此外，仪式性舞蹈、宗教礼仪、歌谣和神话的模式为更古老的信仰提供了始终变化的反映。本文集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保存记忆的这些表面上多种多样的手段之间的相互关联。

记忆本身在19世纪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本书的作者们也考



察了为研究记忆如何发挥作用而提出的一些技术。有关心理官能的种种解释有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把大脑的功能揭示到分子的层次，但有关意识的性质以及心理与物质的关系的长久争论仍然没有解决。正像文化记忆可以体现为物质的人工制品一样，个人经验的记忆在文明的身体中也留下了永久的物理痕迹。颅相学的信仰（参看下图）认为记忆位于颅骨前端的一个特殊的隆起之下，



图“象征的官能”，显示了颅相学的原理。维多利亚时代的颅相学为大脑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各种图式，并把特殊的官能与颅骨的外在结构联系起来，这种结构能够被感知为一些隆起或沟回。在这个例子中，记忆被定位在前额的中心。

现在看来，这似乎幼稚得可笑，但记忆在神经学上当然是受生理过程和化学过程编码的，大脑的某些区域对于储存和恢复记忆特别重要。数世纪以来，人们已经针对大脑功能提出了能够反映当时技术成就的各种各样的类比。漠涅摩绪涅的书和笔使我们想起罗马人把记忆看做一个蜡版的观点或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 *tabula rasa*（白板）说。在我们这个世纪^②，一个电话交换的比喻取代了旧的水力的和机械的模式。但

是现在，它本身已经被以电脑为依据的一些日渐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式取代，而电脑也已经为我们理解学习过程带来了革命。

除了这些对大脑物质结构的研究之外，科学地理解记忆的其他一些途径也得以发展。各种学派的心理学家已经考察了我们如何记忆不同类型的信息，也分析了我们记住的解释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但他们的结论决不限于科学话语。尤其是自精神分析技术发明以来，关于我们如何记忆、遗忘和解释过去的洞见已经被难以割舍地合并到我们的日常感知之中，因此也渗透到文学、艺术和历史的书写之中。本书的跨学科研究的力量之一在于，通过引进各种视角共同分享的问题，各位作者就能够探讨身体与心理、虚构与事实、实体与抽象、个人与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这些配对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反映了构成记忆的复杂整体的不同侧面。

在开篇论文“干扰记忆”中，理查德·森尼特提出了贯穿本文集始终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虽然治疗由消极经验引起的创伤需要共同记忆这些经验，但现代社会的公司经济结构限制了这些被分享的经验的治疗效果。他利用自己的个案研究描述了美国的一群被解雇的 IBM 电脑程序员如何建构各种有关他们被解雇的回顾性陈述。最初是通过找出上司的报复性预谋而试图把他们的失业合理化，后来，他们试图把责任推给外在的因素，如来自其他国家低薪专家的日益增长的竞争。在令人痛苦的第三阶段，他们承认了个人的过失。森尼特相信，现代资本主义激励了记忆是一个私人财富这种感觉：尽管个人想通过再造他们的经历来为自己赋予力量，大公司却使自己与其体制性的过去脱离了关系。

森尼特对人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如何塑造城市空间形式也比较感兴趣。在这一章中，他援引了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后者表明了耶路撒冷历代统治者如何改写这个城市的历史以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文化观。这种对有形物体在体现各种历史观念时所起的作用的关注，也是凯瑟琳·霍尔在其论文“‘视而不见’：帝国的记忆”中所关注的问题。和森尼特一样，她着重探讨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些过程可以揭示建构社会的许多隐秘的假设。霍尔带领我们环游伯明翰的布尔纳维尔主题公园（the Bournville theme park），它是由卡德伯里（Cadbury）当做该公司在 18 世纪末由贵格会出身（Quaker origins）发展而来的一个纪念标志来建造的。她令人信服地证



明了巧克力向美味的民族象征的转化如何铭记在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之中。通过考察布尔纳维尔展览的图像，她揭示了建构先前时代的图像必然引起对事件和态度的压制的一些方式。在霍尔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运作：考察这种集体记忆的编织是使多民族的英国公民理解——或者重新记忆——帝国成长过程中固有的民族张力所不可或缺的。

霍尔和森尼特非常有说服力地令我们想起了创造者对重构过去的影响，无论是重构耶路撒冷还是在遗产陈列中所体现的帝国抱负。正如海登·怀特（Haydon White）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之类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书写历史和书写故事是远比许多人愿意相信的要彼此相似得多的活动。在“记忆与小说的构成”中，A. S. 拜厄特对小说家们把个人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的记忆编织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种种方式提供了诱人的洞见。除了讨论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些不同作家的作品之外，她还在博学和想像力的交织展示中揭示了她本人是如何用心理的标记来塑造和记忆她正在创作的叙事的。

正像我们不再熟悉摸涅摩绪涅的图像特征一样，我们也忘记了记忆的种种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士兵们被告诫“当你们健步如飞地走在火车车厢里时”也不要放松自己，而是要数每英里有多少电线杆，以此训练自己的记忆能力。拜厄特讨论了使用内心意象来训练记忆的经典技术，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已经引人入胜地阐述了这种“记忆之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些视觉的联想方法，后来证明对西方的艺术和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很多人能够成就了在我们看来相当出色的记忆业绩。拜厄特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记忆剧场和作家的记忆术联系起来，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有韵律的清单，普鲁斯特的“小说就是一个大教堂”的观点以及她本人的由语言之线编织的一件衣服的心理意象。

记忆手段在杰克·古迪的“口头传统中的记忆”^③中也具有核心地位，它对有文字的口头文化中的回忆所做的意味深长的分析，试图匡正先前的一些解释。该文补充了森尼特和霍尔的讨论，考察了口头文化中的集体记忆的特点，提供了记忆如何能够体现在物质性的人工制品之中的更多实例，例如被阿散蒂人（Asante）的朝代史讲述人当做视觉提示

的风琴凳（The regal stools）。在对从荷马到印度的梨俱吠陀这些感人的史诗的研究中，古迪集中讨论了由加纳的洛达基人（the Ghanian LoDaga people）编纂的巴格里（the Bagre），在其漫长的人类生涯中，他已经对该民族做了广泛的研究。他凭借一个录音机来表明，与原先被接受的观点相反，长篇叙述不是靠死记硬背和逐字逐句地重复来学会的，而是在它们被记诵时得以改变和展开。

在古迪看来，记忆的这些局限激发了语言的生成性使用，而这种使用恰恰支撑着文化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和语言一样，记忆是人类生存的独有特点，它使我们能够了解一直轰击着我们的大脑的感觉材料并且从中产生意义。如司汤达在本导言开始的那段引文中指出的那样，记忆引起了回忆的过程，但也是有关遗忘的过程。“我对遗忘有一个精彩的记忆”，罗伯特·路易丝·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一语双关地说道；而且一个世纪之前，不是记忆而是它的缺席才迷住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过去十年里，这个话题获得了新的紧迫性，因为关于恢复记忆以及——心理治疗这枚硬币的反面——错误记忆的有效性的争论已经趋于白热化。朱丽叶·米切尔对“记忆与精神分析”的讨论涉及了无意识记忆的运作和形成，她通过把美国、法国和英国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略有不同的陈述与来自她本人治疗患者的生动问题实例结合在一起，探讨了这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当前的诽谤之战在口语中被贴上了“弗洛伊德一击”的标签，但她证明了弗洛伊德式的研究能够给被压抑的记忆所带来的洞见深度。

在某种意义上，遗忘也构成了巴巴拉·威尔逊的文章“当记忆失败时”的主题。和米切尔一样，威尔逊的文章也因为对她本人的患者的研究而得以丰富，但在该文中这些患者是脑部患有疾病或者受到损伤的人。她富有同情心的讨论涉及我们每个人上了年纪时都会受其困扰的错觉的病理性实例——即预料到我们的记忆可能会衰退，因而会远比身体能力的丧失更有力地抹去我们的人性。在概括了我们的大脑保存记忆的不同方式并且比较了健忘症和记忆损伤的各种形式之后，威尔逊表明了那些在重要而特殊的记忆区域有缺失的人如何能够仍然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更加鼓舞人心的是，她还提出了应对疾病或受损伤之后出现的记忆问题的各种对策，从直接给对象贴标签的方法和给任务编一些清单，到



依靠电脑提供的技术帮助。威尔逊在结尾时引用了一段生动的引文，它出自一位患了脑损伤但显然已经成功地康复的青年男子，他说，他不再为失去记忆而悲伤，因为他无法记得记忆是什么感觉了。

随着阿耳茨海默氏病^①的迅速增加，我们中的许多人担心，有朝一日，我们也无法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这种重要的记忆能力。在“大脑如何产生记忆”的结尾，史蒂文·罗斯暗示，他的工作可以为研究阿耳茨海默氏病特有的渐进性记忆丧失提供一个新的路径，并以此强调科学探索的价值。罗斯清楚地表述了记忆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吸引力，生存的这个极具个人特点和主观特点的方面几乎是悖论性的能够由主张实行一种客观研究方法的神经科学家们来研究。他描述了最近发达的神经科学技术如何确定记忆中特殊的大脑定位、神经活动模式和生化过程，特别是以他自己的实验为中心，考察了刚出生一天的小鸡的学习过程。

泰伦斯·谢伊诺夫斯基从一个不同的即计算机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学习这个话题。在“记忆与神经网络”中，他评述了两个宽泛的学习规则系统，即监督的和非监督的。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集中在被监督的学习上，其中想要的系统输出信号预先被特化，该网络以这种反馈为基础，通过试误法(error correction)来学习。谢伊诺夫斯基描述了最近激动人心的网络工作，这些网络不用教，而是自己从自然的声音和意象中提取信息，以对其周围的世界形成智力的概括。由于其明显的技术偏向，这项研究似乎与本书开始的那几个历史的和文学的章节离得较远。不过，拜厄特将她本人作为一位小说家寻求关联的经验与神经网络所做的比较，已经很好地演示了把这些表面上分殊很大的记忆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纽带，她把这些关联描述为“为意义的闪现搜集一个网络，或者用别针别住钩眼扣”。

“哦记忆！你喜欢骗子”，18世纪英国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其歌颂人类的这一难以捉摸的特性时这样说道。尽管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啧啧称奇，但我们仍然分享着戈德史密斯对记忆的欺骗性的这种意识，这表明，它可能永远躲避着试图界定它的分析者的把握，但我们希望本书中的这些文章会强化我们的读者对其永恒魅力的了解。

注 释

- ① Mnemosyne, 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和宙斯一起生了司诗歌、艺术和科学的缪斯女神。——译注
- ② 指 20 世纪。——译注
- ③ 原文意思是“记忆和口头传统”，根据古迪文章的标题，改为“口头传统中的记忆”。——译注
- ④ 根据德国医生 Alois Alzheimer 命名的一种疾病，又名早老性痴呆症。——译注



导言 1

帕特里夏·法拉和卡拉琳·帕特森

I

干扰记忆 1

理查德·森尼特

2

“视而不见”：帝国的记忆 19

凯瑟琳·霍尔

3

记忆与小说的构成 39

A. S. 拜厄特

4

口头传统中的记忆.....67

杰克·古迪

5

记忆与精神分析.....89

朱丽叶·米切尔

6

当记忆失败时.....107

巴拉·A. 威尔逊

7

大脑如何产生记忆.....127

史蒂文·罗斯

8

记忆与神经网络.....155

泰伦斯·谢伊诺夫斯基



I

干扰记忆

Disturbing Memories

理查德·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教授。著有《公人的式微》(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和《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和城市》(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1994)。

达尔文的遗产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著名的一位自然史学家，但由于他的生物时间观，他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记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尔文把生物放在比以前的宗教创生观和生物史长得多的一个时间语境之中，因此，他创造了一个难题：以数百万年来衡量的自然时间与我们在其中用数十年和数世纪来衡量比如社会等级的成长或城市的发展的人类历史时间框架是什么关系呢？历史时间似乎只是进化尺度上的一个标志。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指出，既然个人的事件通常仅仅横跨数天和数月，那么，我们个人的时间经验在达尔文式的事物图式中甚至根本就是更加无关紧要的。

而且，达尔文给自然时间赋予了一个不同的特点：他把它描述为冲突的和竞争的。适者生存的观念后来才进入达尔文的思想，而且他对这个想法也有些模棱两可。他并不像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Alfred, Lord Tennyson）那样想像自然“连牙齿和爪子都是血腥的”，但他的确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系统依赖于它包含的物种的一直处于变化中的力量和弱点，而灭绝和物种衰退是这个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时间是一个毁灭者也是一个创造者。

人类社会和心理学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如此构想的时间呢？对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其他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最著名的是，适者生存证明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痛苦的合理性——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自然时间剥夺了人类社会的理想主义。无论与适者生存的人类相悖的正义理念可能提出什么，斯宾塞认为，当置入自然时间的漫长间隔（longue durée）的情境中时，它也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然”，因为它的经济过程反映了那个漫长间隔中的自然选择。



但是，达尔文的著作也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触动了他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伟大的法国神经病学家让·马丁·夏尔科^①来说，进化似乎解释了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因。夏尔科说，随着情感的增殖并且变得多样化，它们在人类的内心中就相互冲突和竞争起来；男人和女人在自身内部的主观交战就和他们在社会中相互交战一样多——主观交战是“自然的”，我们变成的自我就像在这些内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一个物种。

正是对达尔文的发现的这后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回应，塑造了我们目前思考记忆的方式。记忆是对已经过去的时间的意识。在达尔文的时间框架中，我们的记忆是一些琐细的记录；我们显然无法唤起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物种的数百万年的意识。但冲突的、竞争的达尔文时间序列显然也给我们能够介入其中的那些恢复时间的行为带来了麻烦。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和伊甸园式乐园的平静恢复，一个更准确的记忆行为向我们揭示了痛苦和斗争的一个无穷无尽的记录，这些痛苦和斗争已经把我们塑造成我们现在变成的这些生物。忠实的记忆揭开了遗忘所不能医治的创伤；冲突、失败和灾难的痕迹永远不能从时间中抹去。进化论重构的科学似乎为这些难以根除的痕迹提供了证明。记忆的真实中根本没有抚慰。

卡尔·马克思在其对1848年的革命的研究中独自得出了这种看法。他觉察到革命的怀旧情绪，这可以从那一年为了1789年的大革命而反叛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他后来对达尔文的阅读强化了他怀旧的敌意——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记忆是谎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年轻时就是达尔文的一位热心读者，他从夏尔科那里了解到，当夏尔科描述的内部战争变得无法忍受时，记忆的大门就会关闭；对过去的忠实记忆需要怀旧所需要的勇气，因为当我们适当地回忆时，被意识到的痛苦的拼接只会变得更加厚重。

不过，如果我们记忆的内容没有提供抚慰，那么，我们记忆这些创伤的方式对于达尔文的继承者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些缓解。和弗洛伊德一样，马歇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中也对记忆作用得出了这种观点：被回忆的痛苦或冲突能够被对象化，而当下的痛苦就不能。在我本人的社会学领域，同样强调我们记忆的方式塑造了有关